

建党历程上筚路蓝缕之功

——浅析“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韩一德

(辽宁师范大学, 辽宁 大连 116029)

摘要:在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艰难历程上,陈独秀、李大钊具有开创者的历史地位。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中,唤醒了一代青年,提出要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先锋队与指导者”。李大钊是中国最早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奠基者。“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中共建党史上的佳话,值得深入研究。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陈独秀;李大钊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21)01-0001-06

DOI:10.16160/j.cnki.tsxyxb.2021.01.0001

Pioneering Contribution in the History of CPC Founding: Chen Duxiu's and Li Dazhao's Agreement on Party Founding

HAN Yi-de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China)

Abstract: On the arduous journey to the founding of CPC, Chen Duxiu and Li Dazhao play the pioneering role. During the May 4th New Culture Movement, Chen Duxiu had awakened a whole generation of the youth, and proposed that a strong communist party was needed to act as the proletariat's pioneer and guide. Li Dazhao is the earliest and firmest Marxist in China and the ideological founder for CPC. The agreement between Chen Duxiu and Li Dazhao to found a party was an anecdote in the history of CPC, which deserves a further study.

Key Words: Marxism;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 Chen Duxiu; Li Dazhao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诞辰。在中共创立过程中,“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佳话。是什么历史机遇使陈独秀和李大钊走到一起,承担了这一伟大使命?虽然他们都因故没能出席标志党成立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并不影响他们在中共创建史上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他们在建党过程中的历史功绩、中共一大为什么在上海召开以及陈李未能出席一大的原

因等,将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一、陈独秀在创建中国共产党过程中的历史功绩

陈独秀出生于 1879 年,安徽怀宁县人,较李大钊年长十岁,这十年之差几乎跨越了一个时代。他创办了著名的《安徽俗话报》,曾参与过岳王会暗杀出洋五大臣的行动,辛亥革命后就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1915 年 9 月,他以极

作者简介:韩一德(1932—),女,辽宁大连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

大勇气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更名为《新青年》),树起科学与民主大旗,向封建专制主义发起猛烈攻击。1917年1月他应蔡元培之邀,前往挤满了全国鸿儒硕彦的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往北京,与李大钊、鲁迅、胡适等结成新思想阵营。1917年2月,他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宣称:“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之大旗”,“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1]。1919年《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发表于此。《新青年》极大地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培养了一代青年的成长。

陈独秀与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及五四爱国运动中结下深厚友谊。五四爱国运动,陈独秀和李大钊是公认的领袖。1919年6月,陈独秀因散发由他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遭北洋政府军警逮捕关押,经李大钊等多方营救得以出狱。李大钊为此写了《欢迎独秀出狱》的诗文:陈的被捕,使“我们的‘只眼’(陈的笔名)忽然丧失,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灭了价值”,如今出狱,使“光明复启”,“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2]。

1919年4月,陈独秀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中就指出:为要实现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就必须走俄国人的路,因为20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①。1920年2月陈独秀被迫离开北京抵达上海,之后,其思想政治倾向发生急骤变化,由“学界重镇”“新思潮之首领”转向“政治革命之前驱”。他在《谈政治》一文中,宣告他的政治宣言,“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②。《新青年》编辑部也随陈独秀迁沪,逐渐变成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又开辟了“劳动节纪念号”“俄罗

斯研究”专栏等,开展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及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批判,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的准备。此外,陈独秀注意到开展工人运动的重要性,他深入工人群众中做演讲,创办刊物和工会。如,1920年8月创办了工人周刊《劳动界》,用通俗的语言宣传革命的道理,不久成立了机器工会、印刷工会,会员达千人以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

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进程中,学界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此说最早出自1927年5月22日高一涵在武昌中山大学的演讲《报告李守常同志事略》。1963年,高一涵又做回忆文章《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再次提到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事。鉴于没有其他更多历史资料,所以学界对这件事也是持谨慎的态度。但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明确肯定了这一事实,指出:“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3]

1920年5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由陈独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成立。随后发起组与各地联络,发动共产主义者展开建党的准备。陈独秀在上海发起建党后,曾就党的名称问题写信给张申府,并要他转告李大钊,张申府回忆说:“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大意如此)。”^[4]

关于建党思想,陈独秀明确指出:“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底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③1920年11月,陈独秀和上海发起组成员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宣布“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

① 《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每周评论》第18号。

② 《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

③ 《答黄凌霜》,《新青年》第9卷第6号。

党——共产党”，“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样”^①。他号召革命的青年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像俄国革命者那样，组成无产阶级政党，为建立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而奋斗。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的杰出人物^[5]。他以其勇敢和声望，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中，唤醒了一代青年。在建党初期，作为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和活动家，他为党的创建做了大量工作。党的一大至五大选举他为主持中央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不是偶然的，他在建党初期的历史功绩应予以充分的肯定。

二、李大钊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奠基者

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即是在这一规律之下产生的。但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在苦难的产业工人中自发地产生，必须由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并投身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来完成。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李大钊及其领导下的北京建党活动更能充分体现这一点。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军阀统治的特殊历史环境，革命者寻找马克思主义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李大钊为寻找挽救民族命运的斗争也几经挫折，民国初期他曾经历拥袁到反袁的过程，之后参加了以汤化龙为首的研究系，然而不久“捧老大之粗腿，谋自己的饭碗”的研究系与北洋军阀同流合污，使他彻底失望并与之决裂，从而为寻找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再出发，开启了其人生新的里程。

1917年初，李大钊加入章士钊创办的《甲寅日刊》，至该年底受聘北京大学，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他在《甲寅日刊》《言治》季刊等刊物发

表文章90余篇，足见他用功著作之勤。他在评论国内时政的同时，把视野转向对世界大势的考察，研究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的历史文化，观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世界的影响。1917年4—5月间，他发表《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分析大战中欧洲的社会动向。对于俄国的十月革命，当大多数人还在持怀疑态度之时，李大钊就指出，20世纪初叶世界文明的绝大变动，发于俄国革命的血泊中，“桐叶落而天下惊秋，听鹃声而知气运”，“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6]332}。不久他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指出这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指导这一胜利的是革命的社会主义，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6]364}。他坚信俄国革命不过是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6]367}。从此他加紧对这一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研究，写过多篇深入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文章。1919年秋季，他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表明他已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标志着他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这篇文章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篇系统全面介绍、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文献，是中共思想史上的奠基之作，因此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第一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从一开始就紧密地从中国实际出发，在与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中，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的问题，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阶级斗争实行“根本解决”，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实现民族的解放。

李大钊非常注重对进步青年的积极引导，在少年中国学会、觉悟社等社团活动中，再三强调“主义”的重要性，他说：“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也。”^[7]经过五四时期的考验，一部分追随胡适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新潮社的傅

^① 《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1辑，第6页。

斯年、罗家伦等走向了运动的反面;对邓中夏、高尚德、何孟雄等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李大钊则帮助他们不断提升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自身修养。早在 1920 年 3 月便有了秘密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产生,这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团体。该研究会主要从事两方面活动,一方面搜集、翻译、研讨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著作,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如邓中夏率领平民教育演讲团的部分成员到长辛店办工人夜校,向工人灌输革命思想。该研究会受到李大钊的引领,以后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0 年 10 月,李大钊、张国焘、张申府三人在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就是在这一基础上产生的^[8]。因此它是在中国建党的最初准备、最早细胞。

1921 年 3 月,李大钊在《曙光》第 2 卷第 2 号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指出俄罗斯共产党以 60 万人之大活跃,建设了一个赤色国家。他号召中国的 C 派朋友,在第三国际的帮助下,积极组织一个坚固精密的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它将承担中国彻底大改革的事业,建党伟业日渐提到日程上来。

三、中共一大召开前后

1921 年 7 月 23 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 106 号召开,由于被租界巡捕发现和搜查,会议立即转移到嘉兴南湖一艘船上继续举行。

党的一大为什么在上海召开?首先取决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北京作为首都受军阀集团的直接统治,北洋系、直系、奉系交替争夺,军警遍布、战乱不断,难有革命者容身之所。五四运动受到残酷镇压,大批学生被捕,陈独秀在前门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军警逮捕,经多方营救,三个月后才得以出狱,北京已无容身之地,他不得不前往上海。在这前后,李大钊也多次遭到警方的搜查,几度避难于昌黎五峰山,在与胡适“问题与

主义”的论争中,他的《再论问题与主义》等重要文章,就是在山间韩文公祠内完成的。以上事实足见北京生存环境之艰难。相比较而言,上海中外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发达,尤其是纺织业和机器制造业,这里集中了当时全国两百万产业工人中的大部分,这是共产主义者生存的阶级基础。同时上海的交通比较发达,便于党的发起组与广州、长沙、武汉等地及国外的革命者取得联络。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情况是这里有各国租界的存在,它客观上扩大了革命者活动的空间,党的一大最初正是在法租界内举行的。

其次,上海早期共产主义者虽人数不及北京,但多为留日归来的学者,例如陈望道、李达、李汉俊等,他们已具备一定的社会经验和经济能力。还有上海成员沈雁冰(即茅盾)25 岁时已是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的主编。他们在陈独秀不在的情况下,进行会议的准备,起草相关文件,以及会议遭遇危险时具备转移南湖的联络能力等,为完成一大的召开作出了贡献。而北京的早期党员张国焘、刘仁静、邓中夏、罗章龙等几乎全是北大学子,他们在北京南城租房而居,经济上经常需要李大钊的接济。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情况是,在两位党的主要创始人不到场的情况下,党的一大匆忙召开,这与共产国际的要求和催促密切相关。十月革命成功初期,为清除俄国在远东地区的威胁,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成果,俄共及共产国际极为关注中国及东方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1920 年 3 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到达北京,与李大钊会谈,探讨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此后又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与陈独秀会晤。从此加速了在上海筹备建党的步伐。1921 年 6 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俄共(布)远东局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抵达上海,并带来经费支持,催促早日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据李达回忆:经过交谈,他们要求我们应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于是代表大会便定于 6 月 20 日召开,催促北京、汉口、广州等地代表早日抵沪,直到 7 月 23 日全部代表才赶到上海,大会就在当日召开了^[9]。可见

会议召开之仓促与共产国际代表的要求密切相关。

遗憾的是,史上如此重要的会议,两位主要创始人没能出席。那时陈独秀正在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筹建学校,诸多事务难以脱身;而李大钊则因领导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教职员工的索薪斗争不能前往。当时的李大钊还不是职业革命者,要靠北大的教职薪俸养家糊口及资助学生的一些革命活动。据北大档案载,1919年李大钊的月薪为120元,1920年为140元,同期的陈独秀为300元,胡适为200元^[10]。1921年上半年,北洋政府拖欠八校教育经费半年之久,致使学校正常教学难以为继,数千名教职员工及家属的生活陷入困境,为向政府讨索经费成立了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首推马叙伦为主席,不久因马叙伦被军警殴伤住院,李大钊被一致推选为代理主席。查当年的《晨报》,可以看到八校代表几乎天天都有集会,商讨索薪对策,负责与当局交涉,争取社会声援,帮助员工解决紧急困难等,李大钊在这一斗争中,尽心尽力,众望所归,待到索薪斗争告一段落,党的一大已经开过。

中共一大在匆忙中召开,出席代表13人,代表全国58名党员^①。会议的组织工作主要由上海发起组负责,李达负责大会的文件准备,李汉俊负责会务,会议地址就是李汉俊之兄李书诚的寓所,包括会议转移南湖,也是由李汉俊家庭成员联络安排。这次会议确定了党的名称

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党的章程,选举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领导机构,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

四、南陈北李,英名永存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没有他们的努力,中国共产党不可能诞生。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李达等一批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不论是在理论探讨还是在组织工人运动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而作为导师和领路人的“南陈北李”,他们的贡献在于最早提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并且把建党理念贯彻到建党实践中,且他们二人的影响最大,所以他们在建党中发挥的历史作用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曾经有段时间,历史虚无主义横行,歪曲历史,否定陈独秀、李大钊建党的历史功绩,完全割断了党的历史筋脉,使我们痛心愤慨,改革开放之后才恢复了历史的真实,还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

在反对封建帝制的民主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是一位勇士和旗手,青年的导师。他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冲锋陷阵,不顾坐牢杀头,亲

^① 参见《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29—30页。

中共早期组织成员名录:

(一)北京小组16人: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刘仁静、范鸿劼、缪伯英、张太雷、李梅羹、朱务善、宋介、江浩、吴雨铭、陈德荣。

(二)上海小组14人: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邵力子、袁振英、林伯渠、沈雁冰、沈泽民、杨明斋、俞秀松、李启汉、李中。

(三)武汉小组8人: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伯垂、张国恩、赵子健、郑凯卿、赵子俊。

(四)广州小组4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李季。

(五)长沙小组6人:毛泽东、何叔衡、彭璜、贺民范、易礼容、陈子博。

(六)济南小组3人: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

(七)旅法小组5人: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

(八)旅日小组2人:施存统、周佛海。

自跑到街头散发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传单。转移上海后,他以《新青年》为阵地,写文章,做演讲,介绍俄国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上海的早期共产主义者,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深入工厂作坊,启发工人觉悟,组织工会团体,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组织中共发起组,积极开展建党的筹备工作。所以他在党的一大至五大当选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并非偶然。但是应该说受到时代的局限,他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时间比较短促,欠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对中国的社会性质、阶级关系及革命策略等重大问题存有错误认识,不能正确处理党内外及与共产国际的复杂关系,这是导致大革命遭受挫折的重要原因。大革命的失败,使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倒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其中就包括党的早期优秀领导者陈延年、陈乔年二人。

陈独秀性情孤傲,学者的霸气有余,政治家的雅量不足,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即使 20 世纪 30 年代在国民党监狱中,也拒绝社会各界为他作辩护。著名的大律师章士钊以孙中山为例为他作无罪辩护说:“改良政治不等于危害民国。”他当即表示:“这些话只能代表章士钊,不能代表我。”^[11]到了晚年,他想回到党内,但又拒绝检讨自己。在生活极度困难中,仍不接受社会人士的帮助,贫困交加病逝于四川江津。总之,他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其历史功绩人们不会忘记。

较陈独秀年轻十岁的李大钊,肩负起新的时代使命,他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接受中外名师严格的教育,饱含爱国主义情怀,从创办《言治》杂志开始便表现出对中外历史不俗的洞察能力。他不仅对中国历史有深刻研究,还系统地研究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对 19 世纪法国大革命和 20 世纪俄国革命进行比较,认定了俄国革命的方向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价值。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研究与传播的第一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奠基者,也是最早马克思主义团体的组织者,对

创建中国共产党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后在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全力领导北方大革命的复杂军事政治环境下,尽心竭力,耗尽心血。李大钊品德高尚,为人儒雅敦厚,具有崇高的威望,党内党外从者如云。

李大钊是伟大的学者,一生孜孜不倦,著作等身。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五卷本《李大钊全集》,记录了他在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几百万字的研究著述,是我们学不完、用不尽的思想宝库。他生命的光华,永远照耀我们前进。

参考文献:

- [1] 陈独秀.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4:172-175.
- [2]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 5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39-340.
- [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57.
- [4]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 1 辑[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62.
- [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 纪念陈独秀诞辰一百四十周年[J]. 中共党史研究,2019(10):79-85.
- [6]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7]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67.
- [8] 萧超然. 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M]. 增订本.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91-97.
- [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上)[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33.
- [10] 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李大钊研究会. 李大钊史事综录[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199.
- [11] 陈松年. 回忆父亲陈独秀[M]//王树棣,强重华,杨淑娟,等. 陈独秀评论选集(下).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321.

(责任编辑:李亚平)